

由「反資」到《孩子王》

□白杰明

「反資」使文壇一年來陷於半停頓，卻出了電影《孩子王》。

陳凱歌說，衆多的個人覺悟比趨於一致的群體認同更重要。《孩子王》要打破因襲重複，並以一場戲表達了箇中寓意。

「人的自覺」，正是中國大陸文化反思的核心問題。

一九八七年的中國大陸文壇是富於戲劇性的一年，是以殘酷的悲喜劇為重點和以文明戲為結局的

從八七年一月中以來，中國國營的文化事業在大門上掛出了「內部修理，暫停開放」的大牌子，處於半停頓和消極怠工的混亂狀態中。只有一部份仍舊默默地繼續種其自留地，做其黑戶的作家；其他大部份成了名的官方文人，或是閉門謝客，或是出國遊歷，等待時運好轉再度投產。這種現象，對已經慣了中國文化生活的那種起伏循環的來說，不足為奇，甚至是理所當然。

在中國大陸，人們一向不善於算經濟賬，政治賬則無法計算。至於文化方面和知識界的赤字呢，人們就更不把它放在眼裏了。

一九八七年一年中的「反資」，耽誤了多少作品的出現？破壞了多少人的寫作情緒？浪費掉了多少工作時和精力？真不知道各文化、宣傳機構的頭兒們，在向上級稟報一年的工作總結邀功請賞時，有沒有人細算過這筆損失？

《孩子王》：獨立人格的讚歌

儘管文藝界廣泛的反思熱潮被殺氣騰騰的「反資」的義和團式的鬥爭暫時窒息，但一些重要的反思浪花仍然冒了出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陳凱歌的新影片《孩子王》。

《孩子王》是根據新銳作家阿城三篇以「王」字為題的小說（《孩子王》、《棋王》和《樹王》）的其中一篇改編的。電影的故事主題是按照小說《孩子王》的簡單原型：文革時期，下放到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一個知青被調去教學，去當「孩子王」。他不用課本教語文，倒讓學生自己寫作文，叫學生放棄照抄他人的話，鼓勵他們注重自我。他後來恰好因為這樣，又被調回生產隊裏勞動。故事裏面也穿插了一些《棋王》和《樹王》的細節。

這部新片是陳凱歌自一九八六年初花費了整整一年的時間籌備的。在「反資」高潮，他前後用了數月的時間在雲南拍攝。到了九月他應邀訪美一年之前，他把完成了的作品送審，獲得了通行許可。



▲原著：阿城。

▲導演：陳凱歌。

從狹義來說，《孩子王》是一部寫文革期間，一位有頭腦的知青以獨立思考抵制極左僵化教育體系的影片。但如此去理解陳凱歌這部寓意深刻的作品，還遠遠不夠。不過，我估計，恰好是因為該片有這麼「積極」的內容，北京的長官們才對它開了綠燈。

陳凱歌自己概括地講過《孩子王》的主要內涵：「一個年輕教師，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傳統的文化精神和教化方式，打破因襲重複的習慣，積極地推動具有獨立人格、獨立思維的新一代的成長，因受制於人類自身所造文化的束縛而產生破「道」非「德」的行為。」（《由《孩子王》的創作所想到的》，載於《當代電影》一九八七年第六期，頁九

十八）他對那些動輒往他的成名作《黃土地》扣上「此片體現了民族精神」的桂冠頗感不滿，他在解釋他的新作的主旨時說：「在我看來，衆多的個人

譽，可能又會在內地成為某些人的攻訐對像，「凡

觀眾以娛樂和可供回味的生動形像及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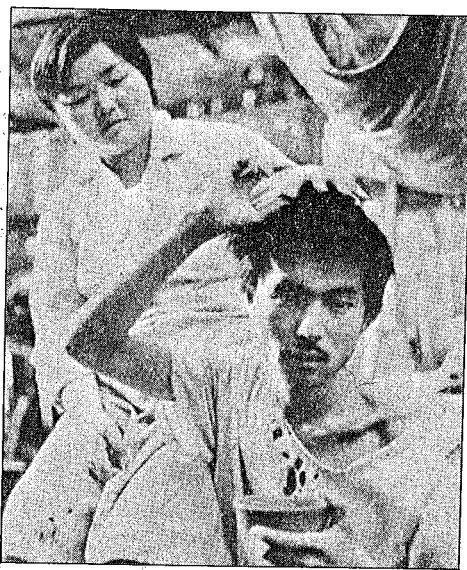
十八）他對那些動輒往他的成名作《黃土地》扣上「此片體現了民族精神」的桂冠頗感不滿，他在解釋他的新作的主旨時說：「在我看來，衆多的個人覺悟比趨於一致的羣體認同更重要。」

不少看過《孩子王》的評論家都有點納悶，不知打哪兒評論陳凱歌這個戲。偏偏陳凱歌也不提供一個自白，弄得大家都有些茫然。

《孩子王》是一部超越中國大陸電影評論模式的電影，甚至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部沒有打任何折扣的中國藝術片」。但世道就是這麼不乖巧：中國大陸好容易才出現這麼一部有水準的作品，而據我所瞭解，到十一月中旬大陸各地的官商卻仍未訂拷貝發行。

文化循環套：從前有座山

《孩子王》於九月間在北京舉行的「中國電影展」備受外國片商和評論家注目，估計在海外和香港很快就能開始發行。到時《孩子王》在外受到讚



▲《孩子王》劇照。

譽，可能又會在內地成為某些人的攻訐對像，「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是中國大陸一種特異的文化現象。

《孩子王》的攝影是繼《黃土地》之後的新躍進。陳凱歌這次的攝影師是顧長衛，也是北京電影學院培養的。（顧長衛最近又給陳以前的攝影張藝謀拍攝張第一部執導的戲，即根據莫言的小說《紅高粱》改編的《九九青殺口》。）影片的音樂是曲小松寫的；主角是與陳同屆的表演系學生謝園。謝以及其他演員（尤其是演孩子王女友來娣的張彩梅和演王福的楊學文）演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充斥中國大陸銀幕的人物符號，十分難得。

陳凱歌和萬之的劇本與阿城的原著，揉合成一個揭示性很強的作品。兩位編劇給原著增添的情節裏，有這麼一場戲：

孩子王在學校接待同他一起被下放的知青。他們湧進教室，各尋座位坐下，讓孩子王講課。他們在紛紛起立行禮間壁然一番後，孩子王訓斥他們說：「不要鬧，大家把手都背在後面去。鬧是沒有好下場的。」接着他就講：「現在開始上課。今天的課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聽。（他堅起食指）我先把課文給大家唸一遍，從前有座山，山裏有個廟，廟裏有個老和尚講故事，講的什麼呢？從前有座山，山裏有個廟，廟裏有個老和尚講故事，講的什麼呢？……」大伙就齊聲說：「從前有座山……」他們一邊高聲地有節奏地說，孩子王則一邊模倣「忠字舞」的動作，手舞足蹈起來。他們興奮地大聲笑鬧以後，外面的小學生突然傳開那句話：「從前有座山……」，然後拿起書包就走。在教室內的知青會瞪口呆地回過頭來……。

在如此非常精彩的一場戲裏，導演描繪了中國

「現實文化循環」（詩人楊煉語）的實質，並且給觀眾以娛樂和可供回味的生動形像及語言。

人的自覺：文藝界的趨向

陳凱歌在談論這部新作的文章裏說，他拍這部電影不是想從「民族精神」的高度去證明或說明什麼，更不是為了效法像謝晉這樣的老導演所為——驗證知識份子的地位和自身價值。陳承認：「許多作品給予觀眾的滿足是政治或社會情緒的滿足，而不是藝術的滿足。」他在肯定電視劇《新星》（根據柯雲路同名小說改編）的積極意義時寫道：「這種創作者和觀眾之間對流宣泄的呼吸關係，多少表現出了我們性格和心理上萬物皆可為器與為我所用的急功近利習慣，而忽視了面對自己，面對個體進行自我判斷的可能性。我們可以為李向南（按《新星》的主角，一名改革者）大聲叫好，卻從不問在一個變化的時代中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我們是怎麼對待自己，對待別人的。從人開始，而不是從社會意義開始，這大概仍然是我們的創作中應該考慮的問題。」

這種對「人的自覺」（楊煉語）的認識，是近年來中國大陸文化反思浪潮中的一個核心問題。許多作家，像詩人楊煉，評論家劉曉波，甚至老作家巴家等等。都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探討這個重大的命題。從「壞事變成好事」的角度來說，一九八七年給中國文化界的有志之士提供了一個可詛咒的良機。由於中共理論和文化主管的橫蠻和失策，經過災難性的一年，反而會使中國大陸的多元文化更加迅速地發展。文藝界這種比較自覺的，並努力擺脫或抵制外在控制的趨向，將來的命運會怎樣，恐怕要看今後十三大路線的包容能量了。